

金九自叙传

白凡逸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大韩民国开国元勋金九(白凡)自叙传

白 凡 逸 志

[韩国] 金 九著
宣德五 张明惠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31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凡逸志:金九自叙传/(韩国)金九著;
宣德五,张明惠译.一北京:民主与建设
出版社,1994.6

ISBN 7-80112-011-6

I. 白……

II. ①金…②宣…③张…

III. 金九-传记

IV. K833.126.7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条34号(邮编100007)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068mm 32开本 9.50印张 6插页 215000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0001-4000册

定价 15.80 元

00060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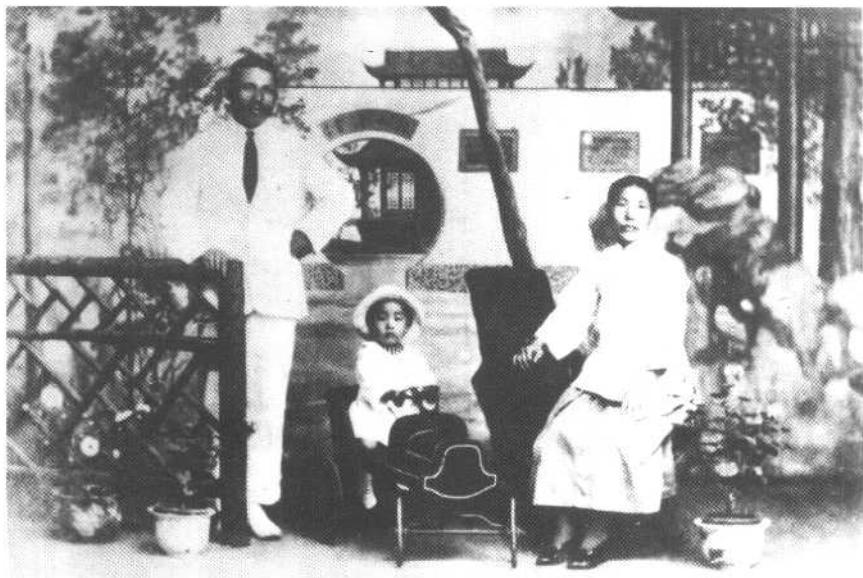
成子夏月白允金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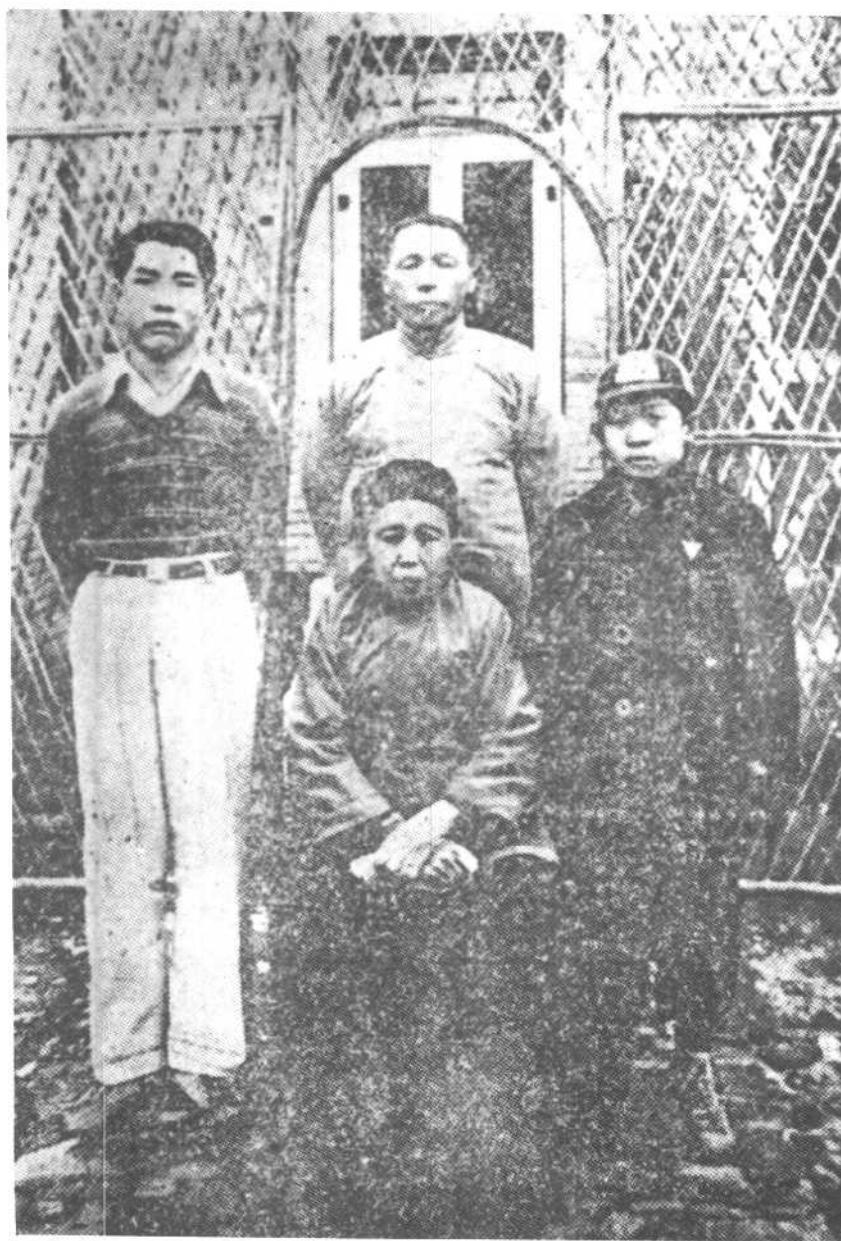
《白凡逸志》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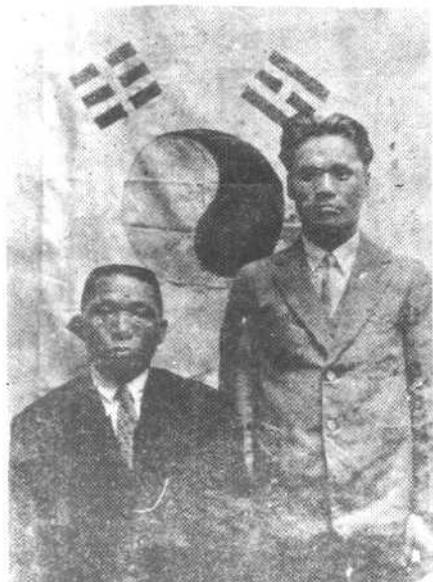
1906年和黄海道长渊光进学校师生合影（后排右一：金九）



1921年在上海和夫人崔遵礼、长子仁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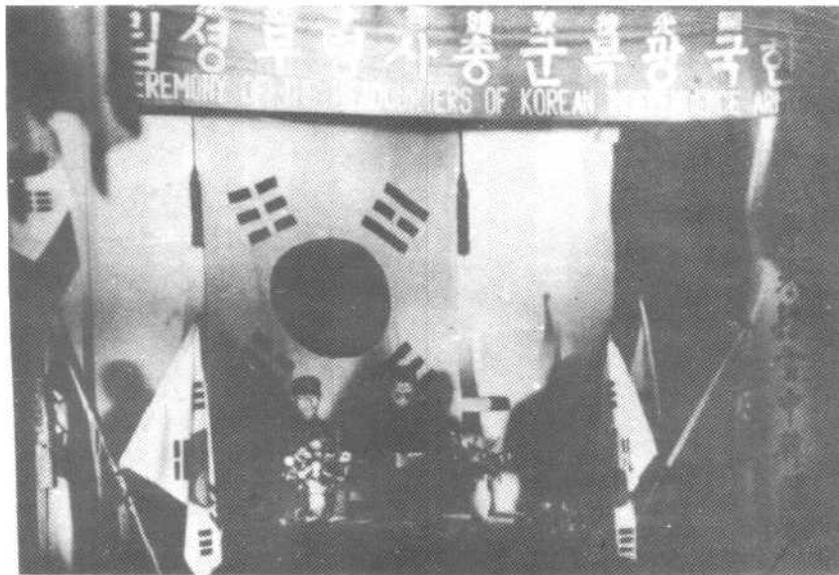
1934 年在上海和母亲及仁、信两儿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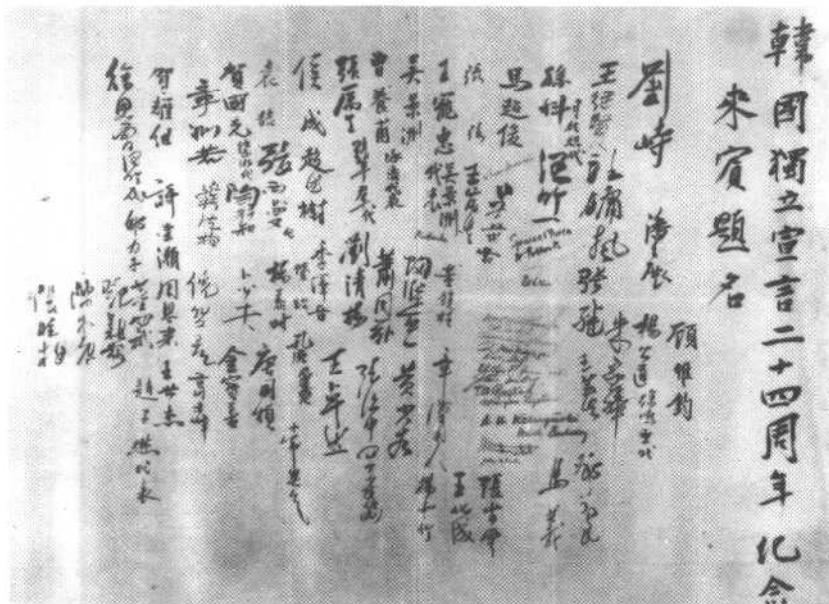
1932年在上海和舉事前三天的尹奉吉
合影

1942年在重庆和大
韩民国第三十四届议政院
议员合影（前排左五：金
九）





1940年在重庆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式上致词



1942年在重庆举行韩国独立宣言二十四周年纪念来宾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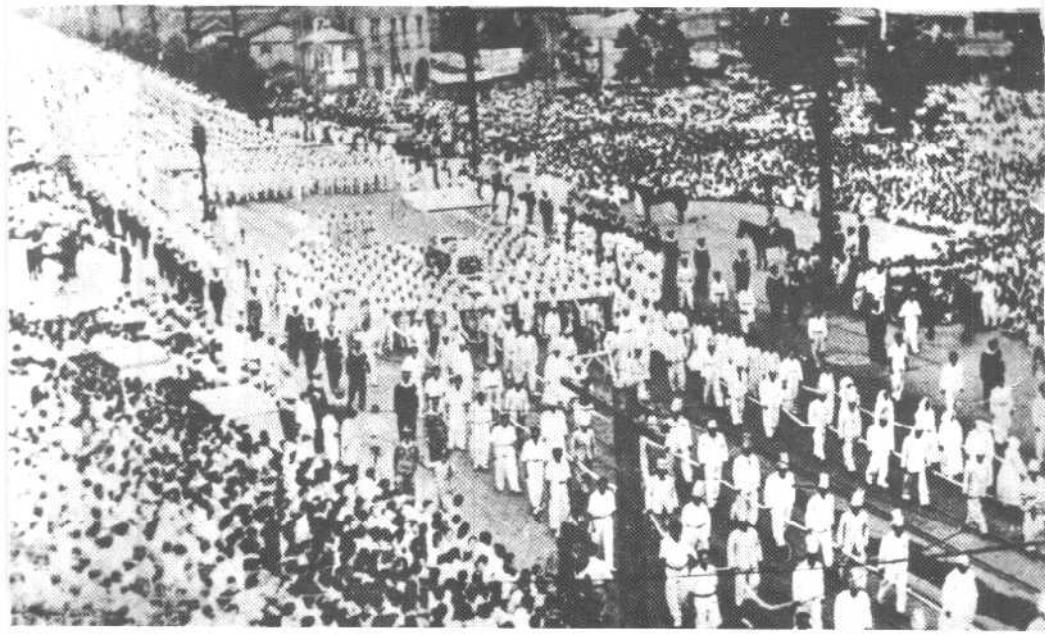
1945 年在重庆韩国临时政府返国纪念合影（前排左四：金九）



1945 年 11 月由重庆返国途经上海，在机场与群众合影（前排左四：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左三：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将军）



1948 年金九一行
在三八线上（右一：次
子金信；左一：秘书，鲜
于镇）



1949 年 7 月 5 日，汉城民众为白凡金九举行国民葬

序

季 美 林

当我还是一個青年学生时，我就仰慕金九先生的大名。当时我们中国正被压在三座大山之下，而韩国也同样处在外寇的直接统治下。我们两国人民同置身于水深火热中，受尽了灾难。《庄子·大宗师》中有一段有名的话：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们两国当时正如“相与处于陆”的鱼类，“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而且应当做的事。我们还没有资格“相忘于江湖”。

由于所学的行当不同，我对韩国所知不多。我对于政治也没有兴趣。但是，我自认为自幼爱国，不敢后人。我爱自己的国家，也尊重敬佩其他被压迫国家的爱国志士。金九先生正是这样的志士中之佼佼者。尽管我对他的活动不甚了了；但是，同他有联系的安重根、李奉昌、尹奉吉等韩国爱国烈士，却是我所熟悉而且异常崇拜的。我对金九先生又焉得不尊敬而且崇拜呢？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到了中年竟同韩国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今天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杨通方教授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当时我正任系主任，他之所以能进北大，我应该说是尽了力的。

到了八十年代，又通过杨通方的关系认识了他的恩师，韩国

2167/35

大教育家，原高丽大学校长金俊烨博士。承蒙金俊烨博士的邀请，在中韩正式建交之前，我就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滔教授和杨通方教授访问了韩国。我们在那里访问了许多大学，访问了韩国社会科学院，访问了古都庆州，结识了韩国爱国大企业家金宇中先生，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韩国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以及韩国学者和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我万没有想到，自己竟能在垂暮之年，得此天外飞来的幸福，不虚此生矣。

从那以后，我逐渐了解到了国立东方语专的情况，了解到了东方语专增设韩语科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我了解到：在所有的这些情况的背后，赫然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在，这个人就是韩国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和领袖，中韩近代友谊长城的缔造者，一代伟人金九先生。

最近我又读了金九先生哲嗣金信先生的一篇文章（载《新华文摘》1993年第12期）。文中对中国的一片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同时我对金九先生的认识也大大地提高了，加深了。我感到无比的振奋与欣慰。

金信先生于1922年诞生在中国的上海，那里是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他父亲金九先生是政府首脑。但家中极贫。他祖母提出了要金九先生找一个职业糊口。但是金九先生以国事为重，斩钉截铁地说：“我死也不离开临时政府的大门！”简短一句话，掷地作金石声，爱国之心气贯长虹，真能够惊天地，泣鬼神，今天读来，仍然虎虎有生气。没有这种精神，哪里能来韩国的独立呢？金信先生的哥哥患了肺结核。但是，临时政府没有钱给病了的同志治病，自己的儿子也决不能享受特权。就这样，儿子终于去世。金九先生悲痛万分，然而他仍然把救国放在首位。只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才能“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真理!

金九先生于1929年,在革命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写了《白凡逸志》,目的是教育儿子。1947年,革命胜利了,才写完全书。为了同外寇战斗,金九先生把金信派往中国空军学校,学习驾驶飞机,为光复做准备。金信先生青少年时受教育,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他曾在中大附中读过书,上过西南联大。他在中国有很多极为要好的朋友。他对中国,像其他在中国住过的韩国的革命志士一样,对中国怀着万分深厚真挚的情谊。他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可见他对中国的感情深厚到什么程度!

金信先生回国以后,担任过许多显要的职务,比如空军参谋总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大使,现任韩国独立运动纪念馆的顾问。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他那“半个祖国”的中国。他在文章中写道:“近年以来,我每年都重返中国,重游故地,踏着父亲战斗的足迹,寻找自己青年时代的履痕。”这可以说是对华深厚感情见诸行动的表现。

又一个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写这一篇序文的时候,我有幸亲自会见了金信先生,他正应邀到中国来访问,陪他到北大来的还有父亲是韩国革命志士的李素心女士。我们晤谈了没有多久,金信先生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们是一见如故!”“一见如故”这四个字,难道不正是我们两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传统友谊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反映吗?面对着金信先生,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多年景仰但始终没有能见面的他的尊人金九先生。站在我眼前的仿佛就是白凡金九先生本人。我对金九先生的尊敬与崇拜仿佛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我此时思绪万端,一下子回忆起来了北大东语系(现改为东方学系)韩语科(朝鲜语专业)走过来的道路。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为了加强中韩(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培养了一批韩(朝)

语人材，他们正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等许多领域内，发挥着良好的作用。现在我国驻韩国的大使就是其中之一。本书《白凡逸志》的译者也是我们的毕业生。中国有一句俗语：“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没有忘，而且永远也不会忘我们的掘井人金九先生等一批南北方的朋友们。杨通方教授和其他一些教员也没有辜负金九先生的重望，在培养学生工作中尽了力。金九先生在天之灵看到这情况也会感到欣慰吧。我作为系的领导人也与有荣焉。

根据金信先生的介绍，他尊人的这一部自叙传在台湾出版过译本，在韩国也印刷过。但是宣德五和张明惠这一个译本所使用的材料，则超过过去的译本，不但全，而且还使用了金九先生的手稿，这个译本是最完善的本子。在译文方面，金信先生和许多韩国朋友，亲自把关，字斟句酌，务求准确、完美，译文应该说是完全可靠的。金信先生说，将来还要出英文译本，而英译本所依据的就正是现在这个汉译本，可见他对这个译本的重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的庄浦明先生慨然应允出版，并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装帧，把此书呈献于读者之前。总之，通过多方面的通力合作，真所谓珠联璧合，不愧是中国出版界一件壮举。此书定将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卜可知。

但是，此书之出版，其意义远远地超出了出版界。从远一点来说，这是继承中韩长期传统友谊的具体体现。从近一点来说，这又是当前中韩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合作精神的具体体现。在中国，目前全国人民正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真正的爱国主义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决不侵略别的国家，也不允许别的国家侵略自己。我们既爱自己的国家，也尊重其他国家爱自己国家的仁人志士。真正的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永远是并行不悖，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毫无疑问，金九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会给我们极大的

启发和鼓舞。

我在本文开头时,引用了庄子的一段话。现在,我国和韩国都早已取得了独立,正在意气风发地建设各自的国家。我们已经不是“处于陆”的鱼了,用不着“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了,我们已经在江湖中,可以畅游了。但是,我相信,我们是人,不是鱼,我们是有感情懂友谊的。不但在江湖中我们不会相忘,即使是在海洋中,我们也决不会相忘,永远不会相忘。

这是我坚定的信念。是为序。

1994.4.17.

著者的话

《白凡逸志》系我在上海和重庆时陆续写成的，本书是依照韩文拼写法把它翻成国语的译本。最后所记的是回到本国之后的事情。

我在上海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之时，是在从事一种置身于死亡边缘的危险工作，为了让已经回国去的两个幼儿以后能够知道我在国内外所经历的往事，就想写这本书，这是我写作的动机。因此，这一本书的上篇，就含有遗书的性质。

尹奉吉义士事件以后，由于中日战争爆发，丧失了我国独立运动的基地和活动的机会，一时几乎无投奔之地，只得暂时蛰伏，徐图东山再起。那时我已年近七十，自感来日无多，为了唤起在美洲和夏威夷的同胞们继续努力奋斗，想把我献身民族独立运动多年的经验和未能实现的抱负一一告诉他们，于是便写成了此书的下篇，这同样可以说是遗书。

我能够活着回到故国，而且能够出版这一本书，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原先希望在我们的国家完全独立自主之后，以这本书与同胞闲话沧桑，然而是幸耶？不幸耶？独立大业未竟，而我以风烛残年之回归故国，将此书呈献于同胞之前，不禁感慨万千。

几位知己挚友认为此书对同胞不无裨益，力促我把它出版，我也就答应了。

为了发行这本书，国士院设立了出版社，由金智林和三堂侄兴斗分任编辑与受理预约之事；许多亲友和单位，有的忙着翻译